

唐碎叶与安西四镇百年研究述论

尚永亮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 20世纪至今的百余年中,唐碎叶与安西四镇的相关问题曾引起学界不断争论,形成多方关注的一大热点和难点。考察、梳理百年研究史和考古发现可知,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八公里处处的阿克·贝希姆遗址,当即唐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城所在地。与此相关,所谓的“两碎叶”、“四碎叶”说则因解读史料粗疏、对当时政治军事状态缺乏深入了解以及忽略新出土文献等而不足取信。至于安西四镇的设置与废弃,大致有三置三弃、四置四弃、五置五弃、六置六弃等四种观点。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四镇初置的时间、初置四镇中先有焉耆还是先有碎叶、调露元年是否收复四镇、垂拱中之“拔”四镇及其失败原因、安西四镇最后失陷的时间等六大方面。重新梳理文献记载,将能够认定的、大致可认定的与有争议的弃置年代分三个层面加以排比考辨,可以认定安西四镇之初置当为贞观二十二年,其间凡五置五弃;四镇中先有焉耆,后有碎叶,此两镇在调露元年、开元七年曾发生两度交替。

[关键词] 唐代;碎叶;安西四镇;弃置年代;百年研究;新出土文献;史料解读

A Summary of Centenary Studies on Suyab of Tang Dynasty and the Four Garrisons of Anxi

Shang Yonglia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00,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literature analysis to study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scholars in this field, combined with some releva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to support our views, this paper answers an important but controversial question in the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studies of Tang Dynasty. Since the 20th century, due t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on Suyab of Tang Dynasty and the Four Garrisons of *Duhufu* of Anxi,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yab and Li Bai, much controversy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f Suyab of Tang Dynasty and the Four Garrisons of *Duhufu* of Anxi has arisen. These pendent issues include the problems about the number of towns named Suyab, their locations, when the Four Garrisons of *Duhufu* of Anxi were established, when and how many times they were respectively established or abandoned, and which one of Yanqi and Suyab was established earlier, etc. The fact that the relevant documents are not clear enough and that the ancient scholars' understandings are different lead to the diverse views of contemporary scholars and the

[收稿日期] 2015-10-26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5-12-31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 CN33-6000/C

[作者简介] 尚永亮(<http://orcid.org/0000-0002-1895-9573>),男,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唐代文学研究。

pendant problems. This paper makes a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last century, combined with the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along the Suyab River from 1900s to 1980s, and concluded that today's Ak-Beshim site, 8km southwest from Tokmok in the Chui River valley of Kyrgyzstan, is the right site of Suyab, one of the Four Garrisons of *Duhufu* of Anxi in Tang Dynasty. Meanwhile, due to the lack of solid evidence,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adequate knowledge of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ircumstances of Tang Dynasty, the arguments for "Two Suyabs" or "Four Suyabs"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of 20th century and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is century are untenable.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rguments about the establishment, abandonment, alternation and many other aspects of Four Garrisons of *Duhufu* of Anxi, for example, they were abandoned or reestablished for three times, four times, five times and six times. After sorting out relevant documents, this paper has identified three periods of establishment and abandonment based on the degree of determination to present a comparatively clear picture of the relevant issues. Firstly, the identified periods are: abandoned in 670 A. D. , reestablished in 679 A. D. ; abandoned in A. D. 685, and reestablished in A. D. 692. Secondly, the roughly identified periods are respectively: reestablished in A. D. 658, and abandoned in A. D. 678. Thirdly, the first established time of Four Garrisons of *Duhufu* of Anxi was in 648 A. D. , and the first abandonment time was in 651 A. D. Moreover, there was a reestablishment effort at least in the late 675 A. D. The Four Garrisons of *Duhufu* of Anxi were abandoned thoroughly after the rebellion of "An-Shi" (An Lushan and Shi Siming, two rebel generals in High Tang Dynasty). During the five establishments and abandonments, Suyab and Yanqi were replaced by each other twice: Firstly, there was Yanqi in the Four Garrisons of *Duhufu* of Anxi without Suyab, but was replaced by Suyab in 679 A. D. . Secondly, Suyab was in the Four Garrisons of *Duhufu* of Anxi for forty years from 692 A. D. to 719 A. D. , but it was replaced by Yanqi in 719 A. D. due to the request by Tang Jiahui, the military commander of the Four Garrisons of *Duhufu* of Anxi.

Key words: Tang Dynasty; Suyab; the four garrisons of *Duhufu* of Anxi; the period of development and abandonment; centenary studies; newly unearthed literatures;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在唐代西域历史、地理、军事研究中,碎叶与安西四镇占有重要地位;又因碎叶与唐代大诗人李白之家世有关,故一直引人关注。但考察相关记载和研究,恰恰是碎叶存在的问题最多,最复杂。诸如名碎叶者为的一处,还是数处?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镇究竟在何地?在初盛唐的百余年中,安西四镇之弃置共有几次?各在什么时间?其中是先有碎叶还是先有焉耆?此二镇之交替各在何时?这些问题,史籍记载既欠明确,亦多抵牾,故自唐代以来就存在疑问和争论,而近百年来争论更趋激烈,并呈多样化趋势。本文联系考古发现及相关研究,综合各家的主要观点,并适当断以己意,以期对这一复杂问题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

一、文献记载之矛盾与古代学者的不同理解

较早记录碎叶其地并为人广泛认可的材料是《大唐西域记》中的一段话:“(跋禄迦)国西北行三百余里,度石碛至凌山……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城周六

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1]卷一}这里的“素叶”即碎叶。贞观初年，玄奘不仅亲至其地，还详细记载了其城规模及“商胡杂居”的概况。此后，唐人杜环于天宝十载（751）随高仙芝西征，于怛逻斯城兵败被俘，在其后来所作的《经行记》中记载：“碎叶国，从安西西北千余里，有勃达岭，岭南是大唐北界，岭北是突骑施南界。西南至葱岭二千余里。其水岭南流者，尽过中国，而归东海；岭北流者，尽经胡境，而入北海……勃达岭北行千余里，至碎叶川。其川东头有热海，兹地寒而不冻，故曰热海。又有碎叶城。天宝七年，北庭节度使王正见薄伐，城壁摧毁，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止之处，建大云寺，犹存……其川西头有城，名曰怛逻斯，石国大镇，即天宝十年高仙芝军败之地。”^{[2]128}这段文字一方面记录了从安西到碎叶的路线、里程，一方面交代了碎叶东临热海（即今伊塞克湖）、西接怛逻斯（Talas，当为今哈萨克斯坦塔拉兹城，古称江布尔）的地理位置，故历来为人所重。稍晚于杜环，中唐德宗贞元年间，宰相贾耽亦曾详细记述安西至碎叶的路线，以及碎叶东距热海、西至怛逻斯的里程，正可与杜环所记相印证^①。鉴于碎叶这样一个位居中亚、临近热海的地理位置，研究者习称之为“热海碎叶”或“中亚碎叶”。

翻检两《唐书》《唐会要》《通典》《元和郡县图志》《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重要文献，其中提及碎叶者，多指此热海碎叶。然而，《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七》“焉耆都护府”条却有这样一段话：“贞观十八年灭焉耆置有碎叶城，调露元年，都护王方翼筑，四面十二门，为屈曲隐出伏没之状云。”^{[3]1134}对这段话首句的断句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将“置”属下，即“贞观十八年灭焉耆，置有碎叶城”；一将“置”属上，即“贞观十八年灭焉耆置。有碎叶城”。若按前者理解，则碎叶城当为贞观十八年灭焉耆后所置，其地理位置在焉耆一带；若按后者理解，则所置者当为“贞观十八年灭焉耆”后设立的“焉耆都护府”，下面的“有碎叶城”为另起的文字。然而，无论是哪种理解，《新唐书》作者将碎叶城置于焉耆都护府下，都会给人造成碎叶在焉耆的印象。否则，为什么要在讲焉耆都护府的时候阑入碎叶一事呢？

大概正是出于此种理解，后代不少学者便将碎叶与焉耆联系在了一起，甚至直接将两者等同起来，认为碎叶即焉耆都护府的治所。如南宋末年胡三省注《通鉴》之“留王方翼于安西，使筑碎叶城”句下即谓：“碎叶城，焉耆都督府治所也。”^{[4]6392}胡氏之后，此类说法所在多有，如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在“碎叶城”条下说：贞观“十八年唐灭焉耆，寻置焉耆都督府，治碎叶城”^{[5]卷六五}。祁韵士等《西陲总统事略》亦谓：“《唐书》载焉耆都督府有碎叶城。”但他又说：“出安西葱岭赢二千里，度雪海，春夏常雨雪。北行赢千里，得碎叶川，其西有碎叶城。是碎叶城唐时为焉耆都督府。”^{[6]8}从而将数千里外的热海碎叶与焉耆都督府混在了一起。与此同时，官修的《（嘉庆）大清一统志》在梳理相关史料后更明确提出：“然则唐有两碎叶，四镇之碎叶，即在焉耆国界欤？”^{[7]卷五二三，330}这样一来，一方面将作为四镇之一的碎叶放在了焉耆境内，另一方面将热海碎叶排除在了四镇之外。尽管作者用的是疑问的、不确定的口吻，但“唐有两碎叶”却已成为其基本结论。

二、20世纪前八十年围绕碎叶展开的论争及考古发现

虽然如上所述，历史上一直存在将碎叶与焉耆相关联，或将之视为焉耆治所的观点，但持怀疑和否定意见者仍然不少。早在《通鉴》注中，胡三省即在《唐纪》永徽六年（655）元礼臣至碎叶城下指出：“自弓月城过思浑川，渡伊丽河至碎叶界，又西行千里至碎叶城。”^{[4]6295}又在王方翼与三姓咽面、车薄战于热海下注云：“碎叶城东有热海，地寒不冻。”^{[4]6409}由此可知，胡氏并非不知碎叶地在热海之西，只是碍于《新唐书·地理志》那段话而将之与焉耆都护府扯在了一起。又如乾隆年间奉敕编

^①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七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49—1150页。

纂的《皇輿西域图志》亦谓：“至王方翼筑碎叶，应即素叶水城，《唐书·地理志》载入焉耆都督府下者，因当时方翼为安西都护，焉耆都督府亦隶安西，故误及之耳。”^{[8]卷一三·291} 20 世纪以后，认为唐代只有一个碎叶，而其地就在热海西侧亦即今吉尔吉斯斯坦之托克马克附近的观点，更占据主流地位。

早在 1903 年，法人沙畹在《西突厥史料》中即考定碎叶其地在今吉尔吉斯之托克马克(Tokmak)或其附近^[9]，此一观点又在其所著《中国之旅行家》中加以表述^[10]。此后，日本松田寿男之《碎叶と焉耆》《古代天山の历史地理学研究》，伊濑仙太郎《西域经营史の研究》，冯承均《西域地名》，岑仲勉《突厥集史》等，亦均从其说。而至 60 至 80 年代的 20 年间，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边疆领土的归属问题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遂涌现出一批相关文章，既从历史角度，亦从政治角度论述早在唐代，碎叶其地即在唐政府的统辖范围，用以驳斥中国历史疆域“从来没有到过巴尔喀什湖”的论调^①。他如吴震《唐碎叶镇城析疑》^[11]、周伟州《略论碎叶城的地理位置及其作为安西四镇之一的历史事实》^[12] 诸文，则从辨误析疑的角度，较具学理性地指出：碎叶在唐代只有一个，其地不在焉耆，而在今楚河南岸的楚伊斯阔业附近或托克马克附近。

在这一时期政治性鲜明的一批文章中，有两篇说理翔实，论证有力，值得注意。一是殷孟伦于 1974 年发表的《试论唐代碎叶城的地理位置》^[13]。该文在爬梳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一方面细辨焉耆碎叶的致误之由，一方面指出王方翼所筑碎叶城只能在中亚，因为此事发生在裴行俭平息阿史那都支一役的调露元年，王氏筑城不在地当要冲的碎叶，反而要到远隔一千七百里的后方且与战役全无关的焉耆，岂非咄咄怪事？其最后结论是：碎叶在中亚，焉耆无碎叶。另一篇是张广达 1979 年发表的《碎叶城今地考》^[14]。与殷文有所不同，张文更重视对新资料和考古发现的利用。一方面，作者“遍检可资印证的唐代西域地理文献和资料”，找不到碎叶位于焉耆的任何线索。虽然《新唐书·地理志》“焉耆都督府”条出现了碎叶的字样，但同一卷内征引贾耽《皇华四达记》所记焉耆至安西的路程，以及同书卷四〇所记西州至焉耆的路程均未提及碎叶，更未见碎叶旁有焉耆的记载，这就使四镇都督府焉耆条的记载在同一卷中失去了着落，因而碎叶其地只能位于热海之西。另一方面，作者通过汉籍和穆斯林地理文献、考古学资料的比勘，认为位于托克马克西南 8—10 公里、克拉斯诺列契(中古萨里克城)东南 24 公里处的阿克·贝希姆废墟，即热海碎叶城的故址。该遗址的中央废墟由东西两部分组成，其东半部文化层较薄，当为较晚期之遗存；其西半部建立在丘冈之上，北临楚河峭岸，主城垣长 2 200 米，整体呈不规则的四边形，与史书所载王方翼所筑“屈曲隐伏出没之状”的碎叶城恰相吻合。杜环《经行记》所记“交河公主所居止之处”^{[2]128}，当位于遗址西南隅城墙拐角处；自此向南 100 米处的一座佛寺遗址，当即杜环所记之大云寺。

从上引张文可知，其主要观点虽并不新颖，但因借鉴了考古资料，又能据以分析整合，与存世文献相印证，故所得结论颇为翔实可信，以致对后出不少论著产生了较大影响。由此也自然表明与碎叶相关的考古发现及新出土文献之重要性。

如果进行追溯，早在 19 世纪后期，围绕碎叶川地区的实地考察即已开始。1893—1894 年，俄国学者瓦·符·巴托尔德考察楚河流域时已注意到阿克·贝希姆废墟，并推断其为黑汗王朝与西辽王朝的都城八刺沙衮。1938—1939 年，伯恩施塔姆率队考察此城，肯定了巴托尔德的推断。到了 1953—1954 年，科兹拉索夫率领吉尔吉斯考古学民族学综合考察队的“楚河流域考古调查分队”，对阿克·贝希姆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并于 1958 年前后发表多份发掘报告，其中有东西两城的布局、各面城墙的长度、相距 250 米的两座佛寺等；同时，依其所测定的几个分属 5—10 世

①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卫江《碎叶是中国唐代西部重镇——驳苏修所谓中国西部边境“从来没有到过巴尔喀什湖”的谬论》，载《文物》1975 年第 8 期，第 7—12 页。

纪的文化层分析认为：这座废城未存留到11至12世纪，不可能是黑汗王朝和西辽王朝的都城，因而否定了巴托尔德和伯恩施塔姆的结论。1961年，英国学者克劳森依据科兹拉索夫的发掘报告，明确认为“阿克·贝希姆就是碎叶”。与此同时，法国学者韩百诗也发表了类似的想法，从而为碎叶古城的准确定位提供了必要的支撑^[14]。

到了80—90年代，托克马克西南八公里的阿克·贝希姆古城遗址相继发现了两块镌刻有汉文的残碑。第一块发现于1982年，是一块红花岗岩质的石刻造像，文刻于造像基座，残留11行，每行4—6字，其中有“□西副都□碎叶镇压十姓使上柱国杜怀□”等字样^[15]。据俄罗斯汉学家苏普陆年科、鲁博-列斯尼乾克，日本学者林俊雄、加藤九祚、内藤みとり及我国学者周伟洲等撰文解读，这里的“杜怀□”即唐代曾任安西都护、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十姓使的杜怀宝。第二块发现于1997年，残存汉字6行，每行7—11字，共约54字。中外学者研究后提出三种意见：一为裴行俭纪功碑，二为汉文墓志，三为室内雕刻^[16]。虽然所得结论不尽一致，但这些碑文特别是第一碑的发现，解决了仅据传统文献不易解决的一些疑难问题，为碎叶古城的准确认定及其与唐代文化之关联提供了有力的旁证。

与境外的发掘相比，国内也出土了一批新的文献资料。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吐鲁番出土的《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等文书，即对咸亨元年(670)至咸亨二年(671)安西都护府之位置以及罢弃四镇提供了若干细节^{[17]471-480}。而在此之前，1968年4月，在吐鲁番阿斯塔那100号墓中，还发现有唐人汜德达的墓志一方，告身两件。其一为永淳元年(682)之“告飞骑尉汜德达”，另一为延载元年(694)之“告轻车都尉汜德达”。前者残损严重，后者内容基本完整，中有“准垂拱二年十一月三日敕，金牙军拔于闐、[安西]、[疏](此三字缺)勒、碎叶等四镇”的话，将之与唐人员半千《蜀州青城令达奚思敬碑》所说“(垂拱)二年，授高陵县主簿……被奏充金牙道行军司兵……君设策请拔碎叶、疏勒、于闐、安西四镇，皆如所计”的话对比，其时限相合。吴震《从吐鲁番出土“汜德达告身”谈唐碎叶镇城》一文联系唐代历史事件，认为汜德达曾于调露元年以“募人”的身份随裴行俭到碎叶，并因拔四镇和破都历岭有功而两度受勋；同时论证了王方翼所筑碎叶城不在焉耆境内，只能在热海以西的碎叶川之南，而延载元年汜德达告身中唐代四镇之一的碎叶镇城就在那里^[18]。吴氏此文较早地对出土文献做出阐释，应是有价值的，但其对碑文“拔”的理解显然有误(详后)，而认为汜德达首次受勋是参与了调露元年夺碎叶之役，也缺少力证。此后王文才撰文指出，“授勋距取碎叶上隔四年，与平度支没有必然关系”；“谓随行俭西征，似出附会”^[19]。这一观点值得重视。至于其对汜德达告身中关于酬勋七转的解释，也与吴文有较大差别。

三、世纪之交三十余年的“两碎叶”和“四碎叶”之争

20世纪后二十年及21世纪前十余年，关于碎叶的论争更趋多元化。依其观点归类，大致呈现出以下三种情形：

第一，多数学者仍坚持热海碎叶说，并依据不同文献对此一问题做出了新的阐释。诸如邹逸麟和赵永复的《唐代的碎叶城》^[20]、薛宗正的《唐碎叶建置论索》^[21]、李瑾的《唐代碎叶镇城历史地理问题研究引论》^[22]等，均较具代表性；他如王文才、郭锋、王小甫、盛刚、陈国灿等人之文虽重在论述安西四镇的变化(后述)，但亦涉及碎叶的位置。其中除李瑾认为唐代碎叶城之具体位置并非今之托克马克，而在今伊塞克湖之西、楚河西岸、托克马克西四十华里处之外^[22]，其他学者对托克马克为碎叶遗址说均未提出异议。

第二，认为唐有两碎叶，即热海碎叶与焉耆碎叶，而焉耆碎叶乃是唐所设四镇之一碎叶镇的所

在地。当代学者中较早提出两碎叶并存的是郭沫若,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所著《李白与杜甫》中,郭氏指出:“考碎叶在唐代有两处,其一即中亚碎叶,又其一为焉耆碎叶。”并在此基础上推断:“焉耆碎叶其城为王方翼所筑”^[23]³。此后不久,范文澜在所著《中国通史》第三册附有《唐朝及邻国方位略图》^[24]³⁴⁶⁻³⁴⁷,其中在焉耆旁注记了碎叶镇,在热海以西、碎叶水以北注记了碎叶城,从而以图表的方式坐实了唐有两碎叶之事。到了 80 年代中期,胡大浚撰《王昌龄西出碎叶辨》一文,虽旨在考察王昌龄之行迹,但其中大部分篇幅则在论述碎叶其地,并上承郭氏观点,明确认为:《新唐书·地理志》将碎叶置于焉耆都督府下,并无错误;唐安西四镇中的碎叶镇始终是焉耆碎叶,与中亚碎叶(按:即热海碎叶)无涉。至于唐史记述的裴行俭讨都支、王方翼筑碎叶,均发生在焉耆境内,而此一碎叶的具体位置则当在“焉耆王都以西一百里”^[25]。

承袭上述观点,李志敏于 2009 年发表《唐安西都护“两四镇不同”问题述要》一文^[26],更全面阐述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镇“与热海碎叶无关”。综括其文要旨,约为三端:一是从相关史料和政令辨析碎叶镇位于天山南道的焉耆境内;二是从碎叶本指“有水地方”之语义及“焉耆之国城居四水之中”的地理环境,论述碎叶镇实即开都河北岸与焉耆新城相距 40 余里的老城;三是通过对《新唐书·裴行俭传》相关文字的解读,认为裴行俭擒阿史那都支的具体地点即在焉耆,王方翼所筑“碎叶镇城”亦为焉耆之碎叶。至于后来与王方翼再次互调职务而任安西都护的杜怀宝所镇守之碎叶镇,自然也是焉耆国的这个碎叶城。由此得出结论:“两四镇不同实在是安西都护驻于天山东南道焉耆国的军镇,在焉耆国碎叶城与其国另一城池焉耆城之间迁移之所致这样的事实。”

第三,在原有的热海碎叶和焉耆碎叶之外,个别论者又提出拨换碎叶和哈密碎叶的观点,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四碎叶”说。

关于拨换碎叶,其所依据者仅为《新唐书·地理七下》“安西”条这样一段话:“自拨换碎叶西南渡浑河,百八十里至济浊馆,故和平铺也;又经故达干城,百二十里至谒者馆,又六十里至据史德城,龟兹境也。”^[3]¹¹⁵⁰这里所说“拨换、碎叶”,显系二地,而误被连文;又因无其他史料支撑,且与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全然无关,故并未引起学者的过多关注,亦乏专门探讨之文。

哈密碎叶是钟兴麒的新见。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钟氏即撰文认为:“作为四镇之一的碎叶,既不是巴湖碎叶(按:即热海碎叶),也不是拨换碎叶,亦不在焉耆周围,而在今新疆哈密附近。”^[27]到了 2000 年,钟氏又撰《唐代安西碎叶镇位置与史事辨析》^[28],依据《新唐书·地理七下》所说“东米国在安国西北二千里,东至碎叶国五千里,西南至石国千五百里,南至拔汗那国千五百里”,推断其中所记碎叶国位于伊州(今哈密市)境内。又据清雍正《甘肃通志》“碎叶城,在肃州西北,今沙州卫西北”,以及清道光《哈密志》所载姚雨春《咏合罗川》诗下小注“哈密有碎叶城,即古西突厥地,有野蚕栖于水草”,认定永徽六年元礼臣所到的碎叶、调露元年设置的碎叶镇、王方翼所筑碎叶城,以及碎叶镇守使韩思忠、周以悌的驻地和活动区域等均在哈密。至于郭元振奏置瀚海军、天山军,也不在巴湖碎叶,而应在哈密。

综观以上三种情形可知,关于碎叶的讨论一方面反映了学者们思维的活跃和多元,类似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多从政治角度立论的现象已不多见;但另一方面,持新说者也存在若干粗疏化、片面化的弊端。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三个带有共性的问题:

首先,无视出土文献等新见史料,仍囿于传统史料自说自话。前面说过,早在 20 世纪初及中叶,关于碎叶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就已经开始,其间获得了不少重要发现,而 1982 年所发现的那块留有“碎叶镇压十姓使杜怀宝”字样的残碑,尤其具有标志性意义,它为我们判断唐代碎叶的所在地及其与四镇的关系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这些实物的存在为后来的研究者提出一个基本要求:如果欲从事与碎叶、四镇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无论持肯定还是否定意见,都不能无视这些物证的存在。然而,遗憾的是,主张“哈密碎叶”和“焉耆碎叶”的论者均舍此绕行;甚至有的文章已涉及杜

怀宝镇守碎叶之事，却无视此前二十余年在热海碎叶遗址已出土之碑文，仍认为杜氏所镇守者乃焉耆碎叶^[26]，这就不能不使其论证在根节处显得薄弱，其学术视野也因此而显得狭窄。

其次，缺乏对当时军事态势的深入了解以及唐王朝西域战略的宏观体察。以唐初西域战略布局而言，其设四镇的主要目的在于应对二蕃亦即吐蕃和西突厥的进犯，故所设军镇皆地当要冲，并形成各具功能、遥相呼应的格局。王小甫《唐初安西四镇的弃置》有一段分析较为中肯：“焉耆与碎叶的交替实际上与唐朝经营西域的战略及西域形势的发展变化有关。简单说来，唐朝是从消灭并取代西突厥对葱岭以东绿洲诸国的控制开始其对西域经营的，所以最初设置四镇是散布镇抚而非集中防御。后来，由于吐蕃进入西域与西突厥余部连兵，隔断二蕃成为唐朝的主要战略目标，置镇碎叶才成为必要。碎叶、疏勒、于阗三镇一字排开，扼守着整个王侯斤路。安西都护府所在的龟兹总其后，依靠焉耆以东的西州地区为基地，同吐蕃和西突厥余部的联盟展开激烈的争战。”^[29]然而，持新说者缺乏这样一种视野，他们多是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就事论事，见木不见林，从而使其所论与当时的军事形势及唐王朝的战略部署相脱节。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他们既难以解释唐王朝在地处西州之东、远离前线、已属后方的所谓“哈密碎叶”设镇的原因，也难以解释四镇中的两镇即焉耆镇与“焉耆碎叶镇”何以仅隔四十里，在这样近距离的两座城池间屡次进行军镇的交替究竟有什么必要。

最后，是对史料的辨析解读和综合利用问题。在唐宋文献中，有关碎叶的记载文字所在多有，有先出者，有后出者，有相互支撑者，也有彼此矛盾者。这就需要材料之来源、先后、信实度予以细致深入的辨析，而后方能去伪存真，使之发挥应有之功用。然而，诸持新说者于此多有欠缺，往往在使用史料时不加辨析，甚或忽略大量对己不利之文献记载，仅择取一二孤证或后出文献展开论证，使其立论在起始处就很不坚固。以哈密碎叶说为例，其所用基本证据有二，一为上引《新唐书·地理志》中那段并非专论碎叶的载记，二为清人所修一二志书及其所引后人诗注。且不说以清人说法来证唐代史事已欠缺说服力，即以所引本属间接性史料的新《志》记载而论，也因其本身存在明显错误而难以取信^①；同时，作者未详考“东米国”的地理方位，也未综合考察其距“安国”、“石国”、“拔汗那国”的准确距离，便径直将之定位于楚河中下游仅距热海碎叶四十里的地带，由此断言“处于东米国之东的碎叶国，就位于伊州（今哈密市）境内”。这种推论恐怕就很随意了。

与此相类，“焉耆碎叶说”也存在疏于史料解读的问题。即以论者普遍重视的调露元年裴行俭擒获阿史那都支、王方翼筑城一事论，个别持新说者在征引文献时，仅据《通鉴》及胡注中的一段话为据，在未加任何辨析的情况下即下结论：“从中可以清楚看到，这个仗是在安西境内打的，距西州不会太远，数日可至。这个碎叶城，当然不会是远在葱岭以西的中亚碎叶。”^[25]也有论者相继引用《新唐书·裴行俭传》和《通鉴》的记载，并做出一定分析，但却轻易地将一直活跃在天山北路、碎叶川一带的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等部移至天山南路的焉耆^②，又将上引文献中“数日倍道而进”连读，给人造成裴氏从出发到抵达目的地仅“数日”的印象，并由此作结说：“西州（今吐鲁番）与焉耆相距为七百里上下，而‘数日倍道而进，去都支帐十余里’，正与此里数相合。须知西州距热海则在三千里上下，这绝不是大队人马‘数日倍道’可以到达的距离。”^[26]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核诸史籍，有

① 考《新唐书·地理志》，有两段涉及西域诸国间距离的文字，一为“石国东至拔汗那国百里，西南至东米国五百里”；一为“东米国……西南至石国千五百里，南至拔汗那国千五百里”。前者谓东米国在石国、拔汗那国之西南，其间距离分别为500、600里；后者则谓东米国在石国、拔汗那国之东北和北部，其间距离均为1500里。二者不仅方位相反，里程也悬殊。由此可见，新《志》在史料之择取和辨析上不无粗疏错漏，实不足取信。参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七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55页。

②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新唐书·地理志七下》：“（碎叶）城北有碎叶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长于此。”（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49-1150页。可知阿史那都支等部一直占据热海碎叶一带，而与天山南路之焉耆无涉。

两点不同:一是自西州至碎叶的距离约为 2 500—2 700 里^①,而非论者所说的三千里。二是在涉及“数日”一段文字时,《旧唐书·裴行俭传》作“行俭假为畋游,教试部伍,数日,遂倍道而进”^{[30]2803};《新唐书·裴行俭传》作“子弟愿从者万人,乃阴勒部伍,数日,倍道而进”^{[3]4086};《资治通鉴》卷二〇二高宗调露元年条作“行俭阳为畋猎,校勒部伍,数日,遂倍道西进”^{[4]6391}。在这三则材料中,两处均在“数日”与“倍道而进”之间着一“遂”字。由此可知,“数日”指的是“教试部伍”的时间,而非“倍道而进”的时间。进一步看,这几则材料均受初、盛唐时人张说所撰《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的影响,该碑如此叙述裴行俭西征都支事:“一言召募,万骑云集。公乃解严以反谍,诿猎以训旅,误之多方,间其无备。裹粮十日,执都支于帐前;破竹一呼,钳遮匍于麾下。华戎相应,立碑碎叶。”^{[31]卷二二八,2305}绎其文意,“裹粮十日”才是“倍道而进”所费时间,其实际用时也可能不止十日(因骈体字数限制,“十日”乃为概指)。若此理解不误,则裴氏率“万骑”自西州“倍道而进”,以十余日抵达两千余里外的热海碎叶并非难事^②。而论者不察,并有意无意地省去了相关文献中的“遂”字,从而导致对此一重要事件的明显误读。

四、安西四镇的兴废、交替及其他

与碎叶地理位置相关,安西四镇的设置与废弃、四镇中先有碎叶还是先有焉耆等一系列问题,从一开始就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并形成旷日持久的争论。综括各家说法,关于安西四镇的置、弃,大致有三置三弃、四置四弃、五置五弃、六置六弃等几种观点。现择其要者,简列于下:

三置三弃。主此说者,以李瑾《唐代碎叶镇城历史地理问题研究引论》^[22]、王小甫《唐初安西四镇的弃置》^[29]等文较具代表性,但其所说置与弃的具体时间不同。李文认为,贞观二十二年(648)第一次设立四镇,永徽元年(650)罢去;第二次置四镇约在显庆三年(658),罢于咸亨元年(670);第三次在长寿二年(693),至开元七年(719)以焉耆代碎叶^[22]。王文则指出四镇首置于显庆三年前,其三次弃置时间分别为:第一次,咸亨元年罢弃,上元二年(675)复置;第二次,仪凤三年(678)吐蕃攻陷四镇,调露元年(679)复置;第三次,垂拱二年(686)废弃,长寿元年(692)收复^[29]。

四置四弃说由吴宗国明确提出。吴氏《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安西四镇的废置问题》一文认为:贞观二十二年始设安西四镇,永徽二年罢弃;显庆三年复置,咸亨元年第二次罢弃;调露元年再置,垂拱二年第三次罢弃;长寿元年第四次复置,直至最后罢弃^[32]。吴文之外,周伟州《略论碎叶城的地理位置及其作为唐安西四镇之一的历史事实》^[12]以及邹逸麟、赵永复《唐代的碎叶城》^[20]二文对四镇弃置也有涉及,但在次数表述上却欠明晰。周文明谓四镇之弃置有三次,但实际列示的却是四次:首置于贞观二十二年,弃于高宗永徽年间;复置于显庆三年(按:此后缺少一次废弃);又置于调露元年,至垂拱二年放弃;长寿二年再次收复四镇,至开元七年又移四镇中的碎叶还于焉耆^[12]。与周文观点相近,邹文是在论碎叶与焉耆之交替时,间接展示了四镇的弃置时间:贞观二十二年,

① 据唐李吉甫撰、清孙星衍校、张驹贤考证《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庭州”条,庭州“东至西州五百里……西至碎叶二千二百二十里”(畿辅丛书,清光绪王灏辑刊本,第 1171 页),两者相加,为二千七百二十里。而据《旧唐书》卷四〇《地理三》,庭州“南至西州界四百五十里”,又据《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四》“北庭大都护府”条所载庭州至碎叶各段里程之数相加(第 1047 页),约为一千九百里;两者合计约为二千四百余里。

② 唐人骑行速度,可参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参见廖立笈注《岑嘉州诗笈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239 页;又如《使交河郡》:“奉使按胡俗,平明发轮台。暮投交河城,火山赤崔嵬。”第 142 页。据《元和郡县图志》(畿辅丛书,清光绪王灏辑刊本),陇州“东至上都四百六十五里”(卷二,第 41 页);西州(交河)“北自金婆岭至北庭都护府(轮台)五百里”(卷四〇,第 1169 页)。这就是说,唐代驿骑日行速度可高达四五百里。又据《梦溪笔谈》卷一一(明汲古阁本),驿传之急脚递“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熙宁中又有金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日行五百里。”如果排除岑诗略有夸张的成分,其所言速度还是可做参考的。

有碎叶而无焉耆；显庆三年，有焉耆而无碎叶；调露元年，有碎叶无焉耆；开元七年，有焉耆而无碎叶^[20]。

五置五弃是李必忠《安西四镇考辨》一文观点：始置时间，最早只能在贞观二十二年闰十二月，迟则可能到贞观二十三年（649）春；废弃则在永徽二年十一月。第二次复置，当在龙朔元年（661）之后，亦即658—661年之间；废弃于咸亨元年。第三次复置，当在上元中；废弃在仪凤三年。第四次复置应在永隆二年或稍后，废弃于垂拱中。第五次置于长寿元年，废弃时间不得早于贞元七年^[33]。

六置六弃说见于薛宗正《唐碎叶建置论索》一文，其具体时间为：第一次，调露元年—垂拱二年^①；第二次，垂拱二年—天授元年（690）；第三次，天授二年—长寿二年—圣历二年（699）；第四次，圣历二年—久视元年（700）—景龙二年（708）；第五次，景龙三年（709）—景云二年（711）；第六次，开元二年（714）—开元七年^[21]。

以上诸家说法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固然与唐宋部分文献对相关史实记载的缺失错乱有关——实际上，早在唐代，一些史家已对初唐时期四镇之交替产生了疑问，如《唐会要》载德宗时人苏冕在提到长寿元年复四镇时，即以充满迷惑的语气说：“咸亨元年四月罢四镇，是龟兹、于阗、焉耆、疏勒；至长寿二年十一月复四镇敕，是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两四镇不同，未知何故？”^[34]卷七三，¹³²⁶但更重要的，则缘于研究者对相关史料的不同解读。概而言之，其问题大致集中在如下几端：

（一）初设四镇的时间

关于四镇之初置时间，主要有两说：一为贞观二十二年，一为显庆三年。持前说者的主要依据为《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中的一段话：“太宗既破龟兹，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以郭孝恪为都护，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高宗嗣位，不欲广地劳人，复命有司弃龟兹等四镇，移安西依旧于西州。”^[30]⁵³⁰⁴他们据此认为：四镇设在贞观年间是没有疑问的，正是由于贞观二十二年已设四镇，高宗嗣位后才有“复命有司弃龟兹等四镇”之说。后世之所以有四镇立在显庆三年的误解，乃是编撰《龟兹传》的欧阳修等叙事不清所致^[20]。持后说者不同意此种说法，认为《旧唐书》这条史料不可靠，因为据吐鲁番出土《唐永徽五年令狐氏墓志》记述西、伊、庭三州诸军事兼安西都护、西州刺史柴哲威于贞观二十三年九月的署衔，表明安西都护府仍在西州，而不是龟兹^[22]。更重要的是，《旧唐书》这段记载与同书《郭孝恪传》的记载有矛盾。因为就在这次征讨龟兹的战役中，郭孝恪“中流矢而死”，岂能于战后再任都护，并“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诸镇？据王小甫考察，《旧唐书·西戎传》中这段话，与《唐会要》《新唐书·吐蕃传上》《新唐书·龟兹传》《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二》等的相关记述均出于同一史源，即载于《文苑英华》卷七六九的崔融《拔四镇议》。比较崔《议》原文，可以发现后来诸书的记载多有改窜或失实处，因此，《旧唐书》这段说法不可凭信，尤其不可作为原始史料引用^[29]。

（二）初置四镇中先有焉耆还是碎叶

这一问题与上述初置四镇的时间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承认《旧唐书·西戎传》那段记载属实，则碎叶当在初置四镇之中；倘若推翻了那段话的真实性，则《唐会要》卷七三所记“咸亨元年四月罢四镇是龟兹、于阗、焉耆、疏勒”，便成了见于文献最早的四镇名称，初置之四镇也就只能有焉耆

^① 薛氏于后来发表的《唐四镇都督府的建置》（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第88—96页）一文又认为安西四镇的初置时间为显庆三年，却未对其此前观点进行系统修正。

而无碎叶。

当然,也有人从当时西域的军事形势出发,考察贞观末年碎叶有无置镇的可能。如岑仲勉较早对《旧唐书·西戎传》的记载做出辨析:“碎叶列四镇是高宗时事,此处当作焉耆,唐是时势力未达碎叶也。”^{[35]29}对这一观点,否定者或举阿史那贺鲁已降唐的史实质问:“根据上引史料,怎么说贞观二十二年平龟兹后始置四镇之时,唐之势力未达西突厥所处的碎叶呢?”^[11]或引《旧唐书·吐蕃传》贞观中“阿史那杜尔开西域,置四镇”的记载,以及崔融《拔四镇议》中唐太宗“复修孝武旧迹,并南山至葱岭为府镇”的说法,认为早在唐立国之初,西突厥已臣服了唐朝^[20]。而这一时期西域诸国如康国、东曹、西曹、何国、安国、石国等均遣使来唐,进献文物,也说明唐贞观年间西突厥游牧的伊犁河、楚河、塔拉斯河一带是完全臣服了唐朝的^[36]。至于焉耆列入四镇,则是《新唐书·西域传上》所载开元七年“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时之事,而在此之前,四镇中只有碎叶而无焉耆^[32]。赞成岑说者则认为:阿史那贺鲁虽降唐,但为时短暂,纯属羁縻性质;降唐期间,碎叶城仍为乙毗射可汗所据;虽然永徽元年以后贺鲁确已夺取了碎叶,然其时已叛唐。由此可证,碎叶一开始即备四镇之说不能成立^[21]。如果从唐朝开始经营西域的意图看,其主要目标在于消灭并取代西突厥对葱岭以东绿洲诸国的控制,故初设之四镇只能有焉耆而不会有草原地区的碎叶;到了后来,由于吐蕃与西突厥余部联兵,遂使隔断二蕃成为唐朝在西域的主要战略,这时置镇碎叶才成为必要^[37]。

(三) 调露元年是否收复四镇

据两《唐书》《通鉴》及相关史籍,从咸亨元年放弃四镇,直到武则天长寿元年,唐才重新恢复了四镇建置。但《唐会要》却载苏冕就两四镇名称不同提出怀疑,谓长寿二年复四镇敕中碎叶已为四镇之一。对此,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及此后一批论文提出调露元年复四镇说,认为裴行俭平都支,唐一度复四镇,并以碎叶取代焉耆;以后垂拱再弃,长寿再置。这样既解释了苏冕的疑问,也可补史籍之疏漏,即诸史漏载了调露至垂拱间四镇曾一复一弃这一史实。然而,李必忠《安西四镇考辨》^[33]、郭锋《唐代前期唐、蕃在西域的争夺与唐安西四镇的弃置》^[38]诸文不同意此观点。李文认为:调露元年虽有裴行俭擒都支、王方翼筑碎叶的记载,但在同年十月就发生了东突厥的反叛,而刚为吐蕃攻陷不久的四镇,也未见有收复的记载,故不能说明此时碎叶已名列四镇,更不能说明四镇的恢复。四镇的复置应在永隆二年或稍后一点的时间,而碎叶也在这次复置中成了安西四镇之一^[33]。郭文进一步指出:此一时期吐蕃仍控制着天山以南四镇所在的塔里木盆地绿洲地区,裴之平叛仅限于天山以北,其选择的行军路线是西州—弓月—碎叶,而非吴震《唐碎叶镇城析疑》所说从西州至焉耆、龟兹再到碎叶的路线,因而此次行动的结果虽然收复了碎叶,却不能说收复了安西四镇。至于两《唐书》等主要史籍对这一历史时期内四镇弃置的记载应是可信的,中间并无漏载^[38]。与李、郭二文观点不同,王小甫一方面确认了仪凤年间吐蕃在西域的强势活动,以及仪凤三年吐蕃陷四镇之事,但另一方面注意到《通典》中关于吐蕃论钦陵于万岁通天二年对高宗时事的一段追述:“和事未曾毕,已为好功名人崔知辩从五俟斤路乘我间隙,疮痍我众,驱掠牛羊,盖以万计。”并据此认为调露元年是西州都督崔知辩先收复了四镇,同年七月裴行俭到西州时,才得以招来四镇诸胡酋长,至裴捉到都支后,唐朝才能在其牙帐附近的碎叶置镇^[37]。

(四) 垂拱中之“拔”四镇及其失载原因

查诸正史,并无垂拱中弃四镇的相关记载,但在前述吐鲁番出土《汜达德告身》中却存有“准垂拱二年十一月三日敕,金牙军拔于阗、[安西]、[疏]勒、碎叶等四镇”的文字,而这段文字又与员半千《蜀州青城县令达奚思敬神道碑》对达奚思敬在垂拱二年充金牙道行军司马时“设策请拔碎叶、疏

勒、于阗、安西四镇，皆如所计”的记载相合，故论者多据此认为垂拱二年确有一次主动放弃四镇的行动。不过，对这两条材料中的“拔”，论者又有不同意见。如殷孟伦^[11]、薛宗正^[21]、郭锋^[38]等即认为这里的“拔”是指夺取、恢复四镇，或一次未成功的攻取行动。而王文才更坚定地认为：将本是献策谋取四镇的“拔”解为撤离，实出臆想，因为“得城为拔”，如果是撤军弃城，何功可论^[19]！殷、薛、郭、王的解释貌似有理，但涉及具体语境，便出了问题。盖唐人用语，“拔”有拔取与拔弃二义，而垂拱二年敕文讲的就是拔军弃镇。这不仅从《千唐志斋藏志》所载《大唐故忠武将军行左领军卫郎将裴府君墓志并序》“属藩落携贰，安西不宁，都护李君与公再谋奏拔四镇，公乃按以戎律，导以泉井，百战无死败之忧，全军得生还之路”^{[39]647}的文意可以看出，而且可以从垂拱四年陈子昂《谏雅州讨生羌书》所谓“国家近者废安北，拔单于，弃龟兹，放疏勒，天下翕然谓之盛德”^{[40]203}的论述得到明证。也就是说，这里的“废”、“拔”、“弃”、“放”是对文，均指放弃。联系当时形势，高宗去世，武则天临朝称制，先发生徐敬业叛乱，接着程务挺、王方翼等名将相继被杀，刘仁轨、裴行俭等宿将也先后死亡，北方东突厥再起，吐蕃乘机入疆，攻破焉耆，大兵压境，在这种情况下，垂拱二年的“拔四镇”，理应视为对安西四镇的一次主动放弃。

既然垂拱二年有一次放弃四镇的行动，何以诸史不载？御史崔融《拔四镇议》也对此闭口不谈，而把弃四镇事说成只有一次，并推到高宗身上呢？吴宗国分析认为：这不是一时疏忽，而是有意为尊者讳。既然武则天把长寿元年克复四镇看作自己的一项重大政绩，并在对待臣谈话时有意不提六年前自己治下丢掉四镇之事，那么，作为臣子的崔融当然也就不能像五年前的陈子昂那样把弃四镇作为一项功德来颂扬，而只有将此事隐瞒起来。为此，必须同时把调露元年复置四镇之事一并隐去，只有这样才能把咸亨元年失四镇和长寿元年复四镇之间的茬口连接起来，即把长寿元年所复之四镇说成是高宗咸亨元年丢失的^[32]。衡诸当日时事与君臣心理，吴氏此说不无道理。至于《旧唐书》中开元前史实，则多据韦述所修《国史》编成，而《国史》的武则天部分即据崔融参加编撰的《国史》和《则天实录》修成，明乎此，《旧唐书》中关于安西四镇的记载出现阙载或错乱也就不难理解了。

（五）安西四镇最后失陷的时间

前举诸说多以《新唐书·西域传上》所载开元七年“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为据，来确定安西四镇的最后废弃。实际上，这是不准确的。因为这条史料只是交代了焉耆与碎叶的交替，而与四镇之废弃无关。同时，也有不少学者以安史乱起为标志，认为斯时唐征各路兵入靖国难，吐蕃乘隙东进，以至乾元之后，“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30]，故四镇已不复为唐所有。对此，李必忠提出不同意见，并据《旧唐书》《唐会要》等文献所载唐肃宗上元中“李元忠守北庭、郭昕守安西府二镇，与沙陀、回鹘相依，吐蕃久攻之不下”，贞元六、七年“北庭节度使杨袭古举麾下二千余人奔西州”、“将复北庭”，结果兵败身亡之事，认为安西四镇的最后放弃不得早于贞元七年^[33]。然细核史实，这里所载只是唐军残余占据原安西、北庭的个别地区，而不得谓之四镇；即就安西、北庭之治所而言，其失陷也当在此之前。如《新唐书·地理四》于“陇右道及安西都护府”条下即载：“贞元三年（787）陷安西、北廷，陇右州县尽矣。”^{[3]1040}“贞元三年，吐蕃攻沙陀、回纥，北庭、安西无援，遂陷。”^{[3]1048}如此看来，四镇之陷落还要更早一些，只是史无明文罢了。

除以上几个主要问题外，在近年的讨论中，论者还涉及唐安西四镇中“镇”的变化、唐四镇都督府的建置、唐代安西建置级别的变化和反复、唐四镇节度使与四镇经略大使的关系等^①，并将视线

① 如陈国灿《唐安西四镇中“镇”的变化》，载《西域研究》2008年第4期，第16-22页；薛宗正《唐四镇都督府的建置》，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第88-96页；薛宗正《唐代安西建置级别的变化、反复与安西四镇的弃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4期，第44-53页；苏北海《唐代四镇、伊西节度使考》，载《西北史地》1996年第2期，第1-17页；等等。

向后推移,考察了怛逻斯之战与唐朝的西域政策、天威健儿赴碎叶等问题^①,虽均不无参考价值,但相较本文所论主旨,则已属外围,故略而不赘。

五、对相关文献、史实的再梳理与重新认定

综上所述,从 20 世纪初至今的百余年间,碎叶及其相关的安西四镇问题已成为史地学界的一大热点,借助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献,中外学者们展开了广泛的考察和论争,对碎叶所在地、碎叶与四镇的关系以及安西四镇的建置、废弃等问题,获得了一个较前更为深入的了解。诸如唐代的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之托克马克附近、作为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镇当为热海碎叶等观点,已基本得到确认。所谓的“两碎叶”、“四碎叶”说因欠缺足够的事实根据而被多数论者所否定。至于安西四镇之初置,究竟是贞观二十二年,还是显庆三年?初置四镇之一是焉耆还是碎叶?安西四镇究竟是三置三弃、四置四弃,还是五置五弃、六置六弃?仅据现在的讨论结果还难下定论,有待新材料的发现和研究的继续深入。但依据文献记载,将能够认定的、大致可认定的与有争议的弃置年代分别加以排比论列,可使相关线索有一个更清晰的展示,也有助于我们在现有条件下做出较为科学的判断。

(一) 可以认定的弃置年代

咸亨元年,罢四镇。《旧唐书·高宗本纪》:“(咸亨元年)四月,吐蕃寇陷白州等一十八州,又与于阗合众,袭龟兹,拔换城,陷之。罢安西四镇。”^{[30]94}《唐会要》卷七三:“吐蕃陷我安西,罢四镇。”^{[34]1325}《通鉴》卷二〇一“咸亨元年”条:“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4]6363}

调露元年,复四镇。前引两《唐书》《通鉴》及张说所作裴、王二《神道碑》均载该年裴行俭擒都支后“立碑碎叶”而还,其副手王方翼“大城碎叶”事;《册府元龟》卷九六七《外臣部·继袭二》更明谓是年“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41]11200}。

垂拱二年,罢四镇。此事正史无载,但据前引吐鲁番出土《汜达德告身》、员半千《蜀州青城县令达奚思敬神道碑》、《千唐志斋藏志》之《大唐故忠武将军行左领军卫郎将裴府君墓志并序》中有关垂拱二年“拔”四镇的敕文和相关载记,以及陈子昂《谏雅州讨生羌书》所谓“国家近者废安北,拔单于,弃龟兹,放疏勒”的说法,则该年弃四镇当无疑义。

长寿元年,复四镇。《旧唐书·王孝杰传》载孝杰该年“与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率众以讨吐蕃,乃克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而还”^{[30]2977};同书《吐蕃传上》,《新唐书》之《则天顺圣武皇后本纪》《王孝杰传》《西域上》及《通鉴》卷二〇五长寿元年条均记其事。稍不同者,《唐会要》卷七三载苏冕谓“两四镇不同”时提到的是“长寿二年十一月复四镇敕”^{[34]1326},在时间上晚了一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收复四镇在长寿元年十月^②,而朝廷的复镇敕文则在次年年末发布。

(二) 大致可以认定的弃置年代

显庆三年,置四镇。诸史无该年置镇的确切记载,但据《旧唐书·高宗本纪上》载:显庆三年二

① 如李方《怛逻斯之战与唐朝的西域政策》,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 16 卷第 1 期,第 56-65 页;毕波《怛逻斯之战和天威健儿赴碎叶》,载《历史研究》2007 年第 2 期,第 15-31 页,等等。

② 据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〇五载:“(长寿元年)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复取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北京)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6487-6488 页。

月，“复于龟兹国置安西都护府”^{[30]78}。同书《地理三》安西都护府条亦谓：“显庆二年十一月，苏定方平贺鲁，分其地置濠池、昆陵二都护府。分其种落，列置州县。于是，西尽波斯国，皆隶安西都护府。仍移都护府理所于高昌故地。三年五月，移安西府于龟兹国，旧安西府复为西州。”^{[30]1647}《唐会要》卷九七所载略同。据此可知，是年已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获得了对天山南路的有效控制；又因贺鲁已平，唐于天山北路之濠池（在碎叶以西，约当今哈萨克斯坦南部楚河以西及吉尔吉斯北部一带）、昆陵（在碎叶以东，约当今新疆准噶尔盆地南部伊犁河流域）新设二都护府，以致“西尽波斯”皆隶安西，故四镇设于此时当在情理之中。

仪凤三年，罢四镇。《旧唐书·吐蕃传上》：“仪凤三年……时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嵩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自汉、魏以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30]5224}《新唐书·西域上》：“仪凤时，吐蕃攻焉耆以西，四镇皆没。”^{[3]6232}以上两条材料，一谓仪凤三年，一谓仪凤时，在表述上略有差异，故稍难定夺。但以《旧唐书》所描述的吐蕃盛况看，四镇陷于仪凤三年更近情实。

（三）有争议的弃置年代

贞观二十二年（648），是否初置四镇之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且极具争议的问题，有必要稍予辨析。

首先，前文提到，反对该年设镇者的依据之一便是《旧唐书·西戎传》等文献中“太宗既破龟兹，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以郭孝恪为都护”数语与郭氏在收复龟兹战役中已死之事相矛盾，故认为其记载不可信。不过，细核各种史料，郭氏之死乃在唐军已克龟兹、其身留守龟兹城四十余日或更长时间之后才发生^①。而在这样一个不算太短的时段内，朝廷是有颁布任命之余暇的；即使任命下达后郭氏已死，也不妨碍史家对其事的记述，故两者看似矛盾而实无。

其次，持异议者认为《旧唐书·西戎传》所记太宗破龟兹、设四镇之史源与崔融《拔四镇议》有关，这是对的，但将崔《议》视为此后诸书的唯一史源，恐怕有些低估了当时史家所能看到的史料。而且即就崔《议》而论，其中一方面指出“太宗方事外讨，复修孝武旧迹，并南山至于葱岭为府镇，烟火相望焉”，一方面述及高宗“复命有司拔四镇”^{[42]卷七六九,4048}。前者暗示了设四镇之事，后者明言将此已设之四镇拔除。倘若太宗时无设镇之事，则高宗何来拔镇之举？如果说《旧唐书·西戎传》的相关记载“不可凭信，尤其不可作为原始史料引用”^[29]，那么，被论者视为可靠史料的武后时人崔融的话总可相信了吧！如果说上引见载于《文苑英华》中的崔文容或有误，那么，《新唐书·吐蕃传上》所引崔文为：“太宗……并南山抵葱岭，剖裂府镇，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内侮。高宗时，有司无状，弃四镇不能有。”^{[3]6079}两相对照，二者在文字上虽小有差别，但在涉及高宗“弃四镇”时所表述的事实是完全一致的。与此相印证的，还有《旧唐书·吐蕃传》所谓贞观中“阿史那社尔开西域，置四镇”的记载^{[30]5236}，以及分载于两《唐书·王孝杰传》中武后于长寿元年克复四镇后所说的一段话：“昔贞观中具陵得此蕃城，其后西陲不守，并陷吐蕃。今既尽复于旧，边境自然无事。”^{[30]2977}“贞观中，西境在四镇，其后不善守，弃之吐蕃。今故土尽复，孝杰功也。”^{[3]4148}这两段大致相同的文字都指向了一个事实，即贞观中“得此蕃城”、“西境在四镇”。

再次，有论者依据吐鲁番出土文献如《唐永徽五年令狐氏墓志》《唐永徽元年二月安西都护府承

① 据《新唐书·阿史那社尔传》（卷一一〇，第4114-4116页）、《西域上》（卷二四一上，第6213-6240页）及《资治通鉴》贞观二十二年条（卷一九九，第6255-6265页），唐军攻克龟兹城后，阿史那社尔留郭孝恪守卫，亲自率军追龟兹王至大拨换城，攻打四十日方大获全胜。而在城破之际，龟兹相那利“夜逸”，并联络“西突厥并国人万余”，回头来袭击留守龟兹的郭孝恪，孝恪力战死之。这说明郭孝恪之死至少已在唐军攻占龟兹四十多天后。如果算上那利向西突厥借兵和组织余部的时间，则郭氏之死似还要更后一些。

敕下来河县符》等,认为永徽元年前后安西都护府不在龟兹,而当在西州^[43-44]。细加考核,其说有一定道理。但据此并不足以否定“太宗既破龟兹,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的记载,而只能说明唐于贞观二十二年移府于龟兹后不久,即因新平定之龟兹内乱而失去了对该地的控制,遂不得已将新设之安西都护府迁回西州,先于永徽元年“秋八月壬午,诏复以布失毕为龟兹王,遣归国,抚其众”^{[4]6271},继于次年十一月丁丑明令:“以高昌故地置安西都护府”^{[30]69}。倘若此前无移府于龟兹之举,安西都护府仍在西州,自然也就不会有此诏告了。因而,我们认为:太宗贞观二十二年确有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并设四镇之事,《旧唐书·西戎传》等史书中的相关记载是准确的,不宜轻易否定。唯该传将碎叶作为四镇之一,似属误笔,盖因据太宗时西域军事形势言,“唐是时势力未达碎叶也”^[35]。

有争议的另一个问题是,既然四镇初置于贞观二十二年,而显庆三年又有一次置四镇的行动,那么,在这十年间必有一次对四镇的放弃,才可以使前后接续形成链条。于是,有学者将此次弃四镇的时间定在了高宗永徽二年,之所以定在此年,即因前引《旧唐书·高宗本纪上》于永徽二年十一月条下载有“丁丑,以高昌故地置安西都护府”之事。这就是说,该年又将安西都护府由龟兹东移至高昌故地亦即西州,说明原四镇已被放弃。联系上引《旧唐书·西戎传》所谓“高宗嗣位,不欲广地劳人,复命有司弃龟兹等四镇,移安西依旧于西州”,两者在时间和事件上正相吻合。因此,将四镇之弃放在其初置四年后、高宗继位第二年的永徽二年(尽管其实际放弃似应早于此时),应是大致不差的。

有争议的第三个问题是,在前列咸亨元年罢四镇与仪凤三年罢四镇之间,也缺少一次复置四镇的年份。据李必忠考证,此次复置当在上元年间^[33],并以咸亨四年“十二月丙午,弓月、疏勒二国王入朝请降”为转机^①。查《旧唐书·高宗本纪下》《通鉴》卷二〇二《唐纪》十八,在上元二年正月都载有“以于阗国为毗沙都督府,分其境内为十州”以及吐蕃遣使请和而“上不许”事。至于疏勒、焉耆设置都督府的时间,《旧唐书·地理志三》均作“上元中”。由此可以推知,至迟在上元二年,四镇已复置。

以上,我们从三个层面对四镇之弃置时间做了一个梳理和辨析。将其作一综合,似可得出以下置、弃四镇的大致年份:

第一次,置于贞元二十二年,弃于永徽二年或稍前;第二次,置于显庆三年,弃于咸亨元年;第三次,置于上元二年前后,弃于仪凤三年;第四次,置于调露元年,弃于垂拱二年;第五次,置于长寿元年,弃于安史乱起之后。

同时,在这五置五弃过程中,碎叶与焉耆的交替约为两次:自始置之贞观二十二年至咸亨元年,四镇中当无碎叶而有焉耆;至调露元年,以碎叶代焉耆遂成事实,此后经长寿元年之复置,直到开元七年,碎叶一直名列四镇。需要注意的是,在此期间,碎叶曾一度为乌质勒攻陷^②,只是到了开元七年,因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3],碎叶才退出四镇名录。

碎叶退出四镇后,即成为十姓可汗所居之地。至开元二十七年(739)、天宝七载(748),唐军均有攻夺碎叶之战事,其城遂渐毁于兵燹。杜环于天宝十载随军至此,曾目睹其“城壁摧毁,邑居零落”之状,城中所剩只有当年交河公主所居之处及建于武后时期的大云寺。时至元初,耶律楚材西

① 此外,森安孝夫《吐蕃の中央すジカ进出》一文认为复置时间在上元三年,见《金沢大学文学部论集》,1984年3月刊;王小甫《唐初安西四镇的弃置》一文认为在上元二年,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117-128页。

②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载:“(乌质勒)尝屯聚碎叶西北界,后渐攻陷碎叶,徙其牙帐居之。东北与突厥为邻,西南与诸胡相接,东南至西、庭州。”(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90页。据内藤みとり《西突厥史の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8年版)、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考订,乌质勒攻陷碎叶当在长安三年(703)。

游此地谓其“城已圯，唐碎叶镇城故墟也”^①，言辞间不无感慨和苍凉。然而，昔日王方翼所筑的那座雄伟城池虽已不可复见，但随着碎叶遗址的考古发现和百年来的深入研究，人们不仅重新确认了此城的准确位置，而且通过它而更加了解那个已经逝去的辉煌时代。就此而言，碎叶及其相关的安西四镇无疑显示出其深藏于历史深处的永恒价值。

（此文为驻访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期间所作，曾得到高研院及浙大图书馆的资料支持，谨致谢忱！）

[参 考 文 献]

- [1] 玄奘：《大唐西域记》第 1 册，见《四部丛刊初编》301 册，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年。[Xuanzang, *The Record of the West Area of Tang Empire: Vol. 1*, in *Sibu Congkan Chubian: Vol. 301*, Shanghai: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35.]
- [2] 杜环：《经行记》，见李德辉辑校：《晋唐两宋行记辑校》，沈阳：辽海出版社，2009 年。[Du Huan, *Record of Travels*, in Li Dehui(ed.), *The Editions and Corrections of Journey Records of Jin, Tang, North and South Song Dynasties*, Shenyang: Liaohai Publishing House, 2009.]
- [3] 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Ouyang Xiu(ed.), *Xin Tangsh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5.]
- [4] 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Sima Guang, *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6.]
- [5]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清稿本。[Gu Zuyu, *The Significant Records from Historical Geography*, The Script of Qing Dynasty.]
- [6] 孙筠、汪廷楷、祁韵士编：《西陲总统事略》，北京：中国书店，2010 年。[Sun Yun, Wang Tingkai & Qi Yunshi (eds.), *The Events of the West*, Beijing: Cathay Bookshop, 2010.]
- [7] 穆彰阿、潘锡恩：《(嘉庆)大清一统志》第 1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Mu Zhang'e & Panxi'en, *The Record of Unity in Qing Dynasty(in Jiaqing Period): Vol. 12*,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8.]
- [8] 褚廷璋：《(乾隆)钦定皇舆西域图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新疆 青海 西藏》第 1 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年。[Chu Tingzhang, *The Map Record of the West Area(in Qianlong Period)*, in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Local Chronicles of Xinjiang, Qinghai & Xizang Province: Vol. 1*, Nanjing: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2012.]
- [9] [法]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E. E. Chavannes, *Historical Data of Western Turk*, trans. by Feng Chengju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4.]
- [10] [法]沙畹：《中国之旅行家》，冯承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E. E. Chavannes, *The China Traveler*, trans. by Feng Chengjun,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4.]
- [11] 吴震：《唐碎叶镇城析疑》，见《新疆历史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151 - 175 页。[Wu Zhen, "An Analysis of the Suyab of Tang Empire," in *A Collection of Academic Seminars on Xinjiang's History*, Urumqi: 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7, pp. 151 - 175.]
- [12] 周伟州：《略论碎叶城的地理位置及其作为安西四镇之一的历史事实》，见新疆人民出版社编：《新疆历史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135 - 150 页。[Zhou Weizhou, "On the Location of the Suyab and the Historical Fact that It Was One of the Four Garrisons of Anxi," in *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ed.), A Collection of Academic Seminars on Xinjiang's History*, Urumqi: 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7, pp. 135 - 150.]

① 耶律楚材《西游录》，转引自俞浩《西域考古录》第 2 册，(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609 页。

- [13] 殷孟伦:《试论唐代碎叶城的地理位置》,《文史哲》1974年第4期,第93-102页。[Yin Menglun,"On the Site of Suyab in Tang Dynasty," *Literature, History & Philosophy*, No.4(1974), pp.93-102.]
- [14] 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5期,第70-82页。[Zhang Guangda,"The Study of the Current Site of Suyab,"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No.5(1979), pp.70-82.]
- [15] 内藤みとり:《吉尔吉斯斯坦发现杜怀宝碑铭》,于志勇译,《新疆文物》1998年第2期,第102-108页。[Mitori Naitou,"The Discovery of Du Huaibao's Stele and Inscription in Kyrgyzstan," trans. by Yu Zhiyong, *Journal of Cultural Relics in Xinjiang*, No.2(1998), pp.102-108.]
- [16] 努尔兰·肯加哈买提:《碎叶出土唐代碑铭及其相关问题》,《史学集刊》2007年第6期,第76-84页。[N. kenga-Hamaiti,"Related Problems about the Inscription Discovered in Suyab of Tang Dynasty," *Collected Papers of History Studies*, No.6(2007), pp.76-84.]
- [17]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Tang Zhangru(ed.), *The Discovery of Documents in Turpan: Vol.6*,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1985.]
- [18] 吴震:《从吐鲁番出土“汜德达告身”谈唐碎叶镇城》,《文物》1975年第8期,第13-17页。[Wu Zhen,"The Research on Suyab in Tang Dynasty from the Certification of Appointment to Fan Deda in the Turpan," *Cultural Relics*, No.8(1975), pp.13-17.]
- [19] 王文才:《唐初复置四镇问题》,《四川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第28-31页。[Wang Wencai,"Th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Four Garrisons,"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College(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2(1980), pp.28-31.]
- [20] 邹逸麟、赵永复:《唐代的碎叶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第95-103页。[Zou Yilin & Zhao Yongfu,"The Suyab in Tang Empire," *Journal of Fud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1(1980), pp.95-103.]
- [21] 薛宗正:《唐碎叶建置论索》,《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第73-89页。[Xue Zongzheng,"Research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Suyab in Tang Empire," *Social Sciences in Xinjiang*, No.4(1984), pp.73-89.]
- [22] 李瑾:《唐代碎叶镇城历史地理问题研究引论》,《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第37-49页。[Li Jin,"Studies on th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Problems of the Suyab Garrison in Tang Empire," *Journal of Chongqing Normal College (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 No.1(1986), pp.37-49.]
- [23]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Guo Moruo, *Li Bai and Du Fu*,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71.]
- [24]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Fan Wenlan,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Vol.3*,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8.]
- [25] 胡大浚:《王昌龄西出碎叶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第33-37页。[Hu Dajun,"Comments on Wang Changling Leaving West of Suyab," *Journal of th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No.4(1987), pp.33-37.]
- [26] 李志敏:《唐安西都护“两四镇不同”问题述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3期,第92-107页。[Li Zhimin,"Study on Two Kinds of Anxi Four-town in Tang Dynasty and the Location of Suyab Town,"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No.3(2009), pp.92-107]
- [27] 钟兴麒:《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位置新探——兼谈诗人李白的出生地》,《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第33-41页。[Zhong Xingqi,"New Research on the Location of Suyab of the Four Garrisons of Anxi: Study on the Birthplace of Li Bai," *Journal of Xin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No.3(1986), pp.33-41.]
- [28] 钟兴麒:《唐代安西碎叶镇位置与史事辨析》,《中国边疆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10-23页。[Zhong Xingqi,"On the Historical Site and Events of Suyab in the Duhufu of Anxi in Tang Dynasty,"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a's Borderland*, No.1(2000), pp.10-23.]

- [29] 王小甫：《唐初安西四镇的弃置》，《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第117-128页。[Wang Xiaofu, "Establishing and Abandoning the Four Towns of Anxi in Early Tang Empire," *Historical Research*, No. 4 (1994), pp. 117-128.]
- [30] 刘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Liu Xu, *Jiu Tangsh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5.]
- [31] 董诰等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Dong Gao et al. (eds.), *Complete Articles of the Ta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 [32] 吴宗国：《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安西四镇的废置问题》，见《丝路访古》，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4-177页。[Wu Zongguo, "The Establishment and Abandon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Emperor of Gaozong and Wu Zetian," in *The Cultural Relics on the Silk Road*, Lanzhou: Gan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2, pp. 164-177.]
- [33] 李必忠：《安西四镇考辨》，见中国唐史研究会编：《唐史研究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6-403页。[Li Bizhong, "An Investigation to the Four Garrisons of Duhufu of Anxi," in *The Tang Dynasty Institute of China* (ed.), *A Collection of Academic Seminars on the History of Tang*, Xi'an: 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3, pp. 386-403.]
- [34] 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Wang Pu, *Tang Huiyao*,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5.]
- [35] 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Cen Zhongmian, *The Complements to and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West Turkic*,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8.]
- [36] 盛刚：《唐朝“碎叶军镇”的设置年代考析》，《池州师专学报》2007年第4期，第59-63页。[Sheng Gang, "The Research on the Year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Suyab Garrison," *Journal of Chizhou Teachers College*, No. 4 (2007), pp. 59-63.]
- [37] 王小甫：《论安西四镇焉耆与碎叶的交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6期，第95-104页。[Wang Xiaofu, "On the Replacements between Suyab and Yanqi of the Four Garrisons of Duhufu of Anxi,"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6 (1991), pp. 95-104.]
- [38] 郭锋：《唐代前期唐、蕃在西域的争夺与唐安西四镇的弃置》，《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第130-142页。[Guo Feng, "On the Struggle between Tang Empire and Tubo Regime in the Early Stage of Ta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and Abandonment of the Four Garrisons of Duhufu of Anxi," *Journal of Dunhuang Studies*, No. 1 (1985), pp. 130-142.]
- [39]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编：《千唐志斋藏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of Henan Province & Cultural Relics Management Office of Luoyang in Henan Province (eds.), *The Stone Inscriptions of Qiantangzhizhai*,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1983.]
- [40] 陈子昂：《陈子昂集》，徐鹏点校，上海：中华书局，1960年。[Chen Zi'ang, *The Chen Zi'ang Corpus*, proofread by Xu Peng,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0.]
- [41] 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校订本）》第11册，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Wang Qinruo et al. (eds.), *Cefu Yuangui: Vol. 11*, proofread by Zhou Xunchu et al., Nanjing: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2006.]
- [42] 崔融：《拔四镇议》，见宋李昉、徐铉、宋白等编：《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Cui Rong, "Discussions on the Troop Withdrawal from the Four-town," in Li Fang, Xu Xuan & Song Bai et al. (eds.), *Gems of Literatur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6.]
- [43] 柳洪亮：《唐天山县南平乡令狐氏墓志考释》，《文物》1984年第5期，第78-79页。[Liu Hongliang, "An Analysis of the Epitaph of Mr. Linghu (The Village of Nanping, Tianshan County in Tang Dynasty)," *Cultural Relics*, No. 5 (1984), pp. 78-79.]
- [44] 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见《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45-146

页。[Zhang Guangda, "Xizhou after the Elimination of Gaochang Country by Tang Empire," in *The First Compilation of Series Articles of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Issues about the West-Area*,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5, pp. 145 - 146.]



· 浙江大学校史专栏 ·

从《竺可桢日记》看国立浙江大学西征始末

——西征第一阶段：出浙江记（一）

李杭春

（浙江大学 社会科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自 1936 年 4 月受命掌校至 1949 年 4 月离开浙大，竺可桢有 13 年的生命与国立浙江大学休戚相连；而这 13 年也是浙大处境最险恶却发展最迅速的历史阶段，尤其是“文军西征”那段光荣而艰难的时光。十年前问世的《竺可桢全集》足以向我们提供全新的角度和史料，还原老校长当年率校西征的全部因由和过程。

1937 年 7 月 14 日，竺可桢辗转抵达牯岭，作为特邀代表参加 7 月 16—17 日由蒋介石召集、160 余人出席的庐山抗日谈话会，“由蒋介石报告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之处置，谓政府已具决心”（《竺可桢全集》第 6 卷《日记》1 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36 页。以下出处相同者，只注页码），那番载入史册的抗日宣言《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即是此时发表的。期间，教育组和国立大学校长也分别集会，并“议决建议于大会：如战事发生，学校不停办”（335），指导学生“战时能为国家服务”（337）。

同年 7 月 24 日，竺可桢回杭州；27 日，“七点半至八点在电话局浙省广播无线电台演讲‘救亡图中每个国民应尽的职务’”（342）；29 日，北平失守；30 日，“南开大学被日本所毁”（343）。8 月 2 日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各所均愿搬长沙”，而军事当局也“已议决令南京居民迁移他往。如不愿迁将强迫之，使全城只留二十万能留守之人”（345）。对此，竺可桢似不甚认同，绍兴人特有的执拗让他更望国人能“头脑镇静，视死如归”（345）。的确，恐慌带来的混乱让人头脑失常，行为荒谬，以至“宁波人搬至杭州，杭州人搬至宁波……”（348）。在竺可桢看来，“彻底抵抗，预备玉石俱焚、同归于尽为上策；如其不能，则与日本人早日言和、能保守领土若干，再求恢复是中策；处于和既不可，战又不能，彷徨歧路是下策也”（348）。8 月 10 号，校内新组成“特种教育委员会”，“嘱黄君理在土山下筑隧道，以为飞机袭击时避难之所”（349）。

土山坐落在当年蒲场巷（大学路）浙大校内，“工学院三面环水，护成土山，风景优美”（据《21 年度国立浙江大学概览》，在当时浙大学生看来，“要算是我们学校最有趣的地方了”（程枳《土山剪影》，见《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 177 期）。土山不高，面积却不小，“三面的土山，系遥接着城墙，围绕在军装局的匡外的”（郁达夫《移家琐记》，见《郁达夫全集》第 3 卷，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74 页），可见一直延伸到现在的环城东路、护城河边，其青山绿水的样貌，或许现在的横河公园依稀尚存。在土山下筑隧道作防空避难之所以抵御敌机侵袭，是竺可桢最初的设想。

但战火却不由分说从华北燃到了上海。8 月 13 号，淞沪会战爆发，“中午邀请之江李培恩、艺专林风眠及医专王吉人在校中膳……之江将仪器等移往山后，艺专移西湖中之黄庄，故浙大移湘湖实为较远矣”（351）。这是竺可桢在日记里第一次透露迁校，不过也像是应之江、艺专之举随口一说。萧山湘湖有浙大农场，素为浙大地盘。18 日，在南京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务会议”时，竺可桢亦仍“劝诸人安心工作，并在山巅作筹备，以为藏身之所……但期地震仪室可以抵当二百磅之炸弹”（354）。

直至 8 月 19 日，“日本人飞机轰炸北极阁，延烧中央大学”（354）。这天，竺可桢正在中央大学图书馆定各校录取新生事。“六点二十分将回寓，适又警报，倭寇来犯……时余与姜亚光、宝堃、温甫夫妇等均立台上二层远瞩，忽闻西北方机声……忽一弹下，中央大学屋顶被毁，所中窗破。余等知在台上之危险，而急奔至地下地震室中。时敌机已过，待五分钟再上，则见太平门外火起，延烧子弹库，半小时方熄，而中央大学内又火光融融矣。”（354—355）第二天，得知“中大内部共打死四人，一为校役，三为建筑工人”；而郑晓沧、卢亦秋等当时亦在图书馆楼下躲避，“有一弹落地，离圈不过四五米云”（355）。

这段亲身经历对竺可桢触动不小。8 月 21 日，一直犹疑的竺可桢决计全家离宁去杭，“新寓方住两年，怅然告别”（356）；22 日，“中午至孤云草舍晤骊先……渠亦不主张中央研究院一哄而散，并谓浙省府仍照常办公，惟对于大学则主张迁移”（356）。骊先即朱家骅，时浙省政府主席。

（未完待续）